



■ 张晓芸 著

翻译研究的 形象学视角

——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



上海译文出版社

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

——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

张晓芸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张晓芸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7

(学人论丛)

ISBN 978 - 7 - 5327 - 5490 - 8

I . ①翻… II . ①张… III . ①长篇小说—英语—文学
翻译—研究 IV . ①I046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1170 号

**本书所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 ——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

张晓芸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78,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490 - 8/H · 992

定价：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36161448

序言一

张晓芸女士以翻译研究为目标的求学之路,主要是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走过的。2001年9月,她先到洛外参加硕士研修班,第二年考取了该校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5年3月取得了硕士学位。当年,她又考取了该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如果说她两年半的读硕经历还算一帆风顺的话,她的读博之路却可以说是崎岖不平的,整整历尽五年的磨难才修成“正果”。本来,她该于2005年9月入学,因为怀孕生育而获准休学一年。但是强烈的读书欲使她迫不及待了,2006年3月,她产后不足半年,便带着母亲和女儿来校读书。坚持了一个学期之后,觉得孩子在身边对自己牵扯太多,便索性把孩子交给母亲带回老家抚养,自己集中精力在校读书。她的艰难困苦,绝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问题,读博期间,她还面临调动工作单位、跟爱人分居两地、生活条件艰苦等种种困难。但是,张晓芸从未被困难压倒过,她那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矢志不移的坚强毅力,始终

让我为之感动。三年的博士生课程学习,第一年和第三年是在洛外进行的,第二年则到清华大学访学。在洛外,她选择了多门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既有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英汉对比与翻译、文学翻译与译作研究、翻译批评研究、中西翻译史等专业课程,又有西方文论、学术前沿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等相关课程,这些课程不仅为她打下了比较厚实的翻译理论基础,而且拓展了研究视角。在清华大学访学一年,她选修了王宁教授开设的西方理论前沿研究和比较文学概论两门课程,以及罗选民教授开设的翻译研究课程;与此同时,她还旁听了北京大学刘树森教授开设的中西翻译传统对比研究课程,以及孟华教授开设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课程。访学期间的这些经历,帮助她进一步夯实了学业根基,开阔了学术视野。

张晓芸做翻译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跟踪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理念,努力保持所作研究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她于2005年3月通过的硕士学位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品牌翻译——目的论框架中的多视角实证研究》,便是一个例证。论文选取的是“品牌翻译”问题,以“目的论”作为理论框架,以“全球化语境”为背景,进行了“多视角实证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

当然,更能体现她的创新精神的研究成果,还是她2010

年12月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该论文试图从形象学的角度对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进行探讨和研究,这无疑触及了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大课题。作者认为,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塑造他者形象的活动,从文化他者的形象,主权他者的形象,到作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形象,原作通过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形象,都是通过翻译活动实现的。在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各种操控与改写,可以使他者的形象与其本来面貌发生很大的偏差,更可以对他者形象预先设定或者有意遮蔽。因此,从形象学角度所进行的翻译研究,关注的绝不仅是必然发生变易的翻译过程中所生成的形象的真伪,而是广泛地关注形象得以生成并定型的过程,定型化形象的持久性与传播性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通过塑造他者形象对于自我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总之,该论文对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翻译在塑造他者形象及异国形象中的作用的探讨,对翻译活动中原作者、译者、读者、赞助者等主体形象的分析,为我们重新认识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文选择美国“垮掉派”作家凯鲁亚克及其代表作《在路上》在中国的形象演变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分析翻译活动中的形象建构。作者对凯鲁亚克及其代表作在中国的形象演变,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分析中国各时期翻译政策

对“垮掉派”文学态度的影响,描述凯鲁亚克在中国如何由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形象的代表,演变为时下备受追捧的经典作家,以及《在路上》如何从内部出版的批判教材演变为一版再版的经典之作;二是通过对《在路上》不同时期的不同译本的描述性研究,论述了译者通过译序、译后记或评论等类文本对作品形象所产生的导向,以及译者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改写而对作品形象所产生的变易。可以说,论文所选个案颇具代表性,有力地论证了原作者及原作在译入语文化中发生的变形过程,并深入挖掘了变形背后的深层原因。

另外,该论文将以往翻译研究中所忽视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翻译政策、翻译出版机构、译者类文本、读者反应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从而将对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文化国际关系的层面。该文结论中提出,在翻译活动中恪守保持文化自我、维护自我认同的文化安全原则,对于我们认识翻译在文化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具有警示意义,有助于我们在“尊重差异”的潮流中保持清醒,从而使翻译活动最终实现完善自我、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翻译中的形象研究似乎还处于初始阶段,在这方面较为系统的、高水平的成果为数极少,张晓芸的这部论作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当

然,该论文作为一个创新的尝试,虽然有诸多可贵之处,但也难免会存在某些不足,比如从大的方面看,理论探讨尚不是很完善,还没有形成一个翻译形象学研究的完整理论框架;从小的方面看,对《在路上》不同译本的分析做得还不够细致等。这说明作者的研究还有潜力可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该论文的推动下,我国翻译界在这方面定会有更多、更有力的论著问世。

孙致礼

2011年7月18日洛阳

序言二

托孙致礼教授的福，沾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光，我曾多次参加那里的研究生答辩，有幸结识了张晓芸博士。她的硕士论文和她的博士论文，都曾看过；同时，对她也多有了解。深感作为女性，即使在当今世界，一心问学，还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流传的那句“男人，女人，还有第三种人——女博士”，或许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在一个男性“多”于女性的世界，若是就“逻辑”话语的“理性统一”或“同一”而论，女性“先天”“有别于”男性，但还是必须按照“大一统”的“既定规则”和“章程”来思考、行事。在学术“科学主义”的近乎苛刻的要求下，女性的天性上的“差异”似乎很少在学术探讨之中得到强调或体现。在潜心问学的同时，女性要在心目当中永远留下一块“自由”的天地，为儿女、为家庭、为父母，但唯独不会太关注或爱惜自己。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人性的光辉，永远是向着别人发出的。在很难见到“逆向”反射的同时，似乎天地始终是“他人”的。学业和生活上双重的责任和追求，所能存留下的，对于一个有志好

学的人来说,也就是:阅读、思考,写作;再阅读,然后是再思考,再写作;了无休止,而且,“正果”难见。

博士答辩的顺利通过,可以使这种“居间”生存状态发生些许的变化。至少,再不用像以往那样,要把自己闭锁在一个“只有书”的世界之中,尽管,也只有那样,才可“远离尘嚣”,在一段时间里静静地思考心之所得,付诸笔墨,然后公诸于众期待与识者的交流。因此,晓芸通过答辩的那一刻,我们这些参与了答辩委员会的人,的确和她一样激动。现在,得知晓芸的博士论文要作为专著修改出版,心里当然也非常欣慰。终于,又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能赢得更多的读者了。

不过,一听到让我写“序”,就觉得有些“沉重”了。“序言”,序言,若能“序于其言”,便一定是在“言语”之“前”。这怎么可能?“言”已经“在那里”了,怎么会另有一可以“为之序”的“言”呢?所以,论者指出:“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前-言(*fore-word*)?言说-之前?但是,言说之前,‘之前’这个词,甚至‘言说’这个词,总是已经被说了。如果在这‘之前’中,我们听到并理解了一种原初的沉默(如果它能够让人听到的话)像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的原初的沉思……那么就没有什么之前的言说。这个世界既没有什么之前,也更加(*a fortiori*)没有一个前-言,一个之前-言说了。”^①的确,“序-

① 引自:[法]马克弗罗芒-默里斯·冯尚译.海德格尔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言”也和引文之中所讲的“前-言”一样,似乎也是没有办法与“言本身”计较“前后”、相交“长短”,因而,也就是无法与“言”本身分开的。

这里引用的话,似乎是从“言”的“本体论”角度来分析的,其中含有结构主义的那种语言就是一切的意味。不过,我们在实际运思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前后顺序,因而,也就不能不推出“序”了,尽管不一定是“推重”这样的“序”。至少,这里所作的“序”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不管怎样,不妨把引文之中讲的话当作笨拙的人的推脱不得因而特别需要引用的一个借口。“序言”既然还得写下去,而本人又不善此道,就不能不先做些联想。

记得一部钱锺书先生的传记中讲,他在上大学时受乃父之托,代笔为一历史大家写序^①。我们今天或许已经找不到那样的天纵之才,能那样让人放心地“代笔”,否则晓芸一定会另找一位高手来做在下目前在做的事情了。也听说胡适为人作序,洋洋洒洒写下去,一不小心,写得比原著还长,只好自己另外出一部著作。显而易见,在下既无能力当然也就不会那样“别出心裁”,不然,晓芸也一定会“敬而远之”了。还见到过钱锺书先生所作的另一个序言,只是引用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一句话,来为一部比较文学的年鉴“张目”。而钱锺书先生一向是以“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的态度对待被

^① 李洪岩. 智者的心路历程: 钱锺书生平与学术.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59.

批评的著作或作品的。他尝引瓦勒利(一般译为“瓦雷利”)的话指出:“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①。我们“常人”或许不一定有那样的资格,对人说三道四,尤其是在面对辛辛苦苦写出的高水平的著作的时候。而且,钱锺书先生所强调的,在某种程度上,同伽达默尔所说的那种“理解就是别样的理解”倾向一样^②,是要把“理解”视为“创造性的误解”。可是,我们也不一定有那样的力量或能力,因而,也就不一定有必要不懂装懂甚或故作姿态。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莎士比亚剧中说的“简洁是才智之魂”能起到启发作用。只有“简洁”,或许也才是“序之言”应该做的。因此,该是切入正题的时候了。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形象”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是非常重要的。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名著《政治无意识》之中开宗明义所强调的:“总是要历史化!”^③的确,“形象”始终是历史性的。任何事物最终留下的就是这样那样的形象,因此,我们对她/他/它们的记忆、追溯以及探究,也就是如何加以“复原”,使之“面如起初”。很明显,晓芸的这部著作体现出了双重的历史性:一是“形象学”本身,就是对形象历史性的认可的一种探索;二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中国传播

^① 钱锺书. 谈艺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611.

^②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62.

^③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5.

史的钻研,也一样是有价值的历史叙事。

瓦尔特·本雅明指出,“人类从摄影之中撤退”^①。果真如此,则不仅“活着的人会成为幽灵”,而“死者也会变为鬼魂”。但问题是,我们在思想的飘飞之中,在精神的运动之际,不都是这样那样的“魂灵”吗?因此,“摄影”摄不走我们的“真相”,我们的历史追溯反倒可以追回到“真相”出现的时刻并有可能使之加以呈现。“摄影”是这样,一般意义上的“形象”也是如此。形象学的研究不就是这样的追求吗?

《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汉译为个案》从“形象学”的角度入手,以美国小说家凯鲁亚克的作品《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当中的处理及其变异等问题。作者指出,“翻译如同自我为他者摄影,不同的角度会反映出不同的形象,而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更可以对他者形象预先设定或者有意遮蔽”。“形象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就是通过研究最终形成他者的形象,辨别出翻译产生过程中的各种操控与处理,并进一步发现这些处理的原因与目的所在。”

很明显,此著立意新颖,视角独特。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类型的翻译,或者说一种特殊的“文类”,其独特性应该首先得到认可,否则其中的规律便无从谈起。此书作者正是从文

^① 见 Walter Benjamin 撰, Harry Zohn 与 Edmund Jephcott 英译, “Work of Art of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Third Edition]”, 收入氏著, Howard Eiland 与 Michael W. Jennings 编,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1938—1940*, 第 258 页,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学翻译的这种独特之处入手,抓住了它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创新意识。毕竟,我们的翻译研究就应该是这样的针对性很强的研究,而独特的视角才能引出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细读全书,不难看出,作者不仅对中华文化之中的“形象”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而且也颇为详尽地对西方的“形象论”进行了历史追溯和分析。这种历史化的视角,为后文论述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历史化的倾向还表现在对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语译本的历史遭际的描绘和分析上。作者下了很大力气,对有关译本的历史性接受进行了探究,突出了翻译在历史语境之中所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诗学的研究范畴,但只有跨出这一范畴,走向历史,才能显现出诗学与“观念史”是密不可分的。

就本书的结构而论,作者先是在“绪论”之中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定下基调,然后在第二章介绍凯鲁亚克的生平、创作成就及其思想;第三章探究《在路上》在中国的接受史;第四章分析译者所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其文本创造所产生的作用及其问题;进而在第五章转向归纳——点出在中华文化语境之中文学翻译的“形象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回归理论,使论题得以升华。

纵观全书,理论分析与实例研究相结合,不仅在文学翻译理论上有所开拓和掘进,而且,也对翻译史之中意识形态

的作用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不管是就选题而论,还是从谋篇布局和具体内容来看,此书都是一篇显现出创新,又含有重写“历史”勇气的大气之作。

以上这些都是在下读晓芸的著作粗浅的体会,有可能并没有抓到此书的精义。只好留待作者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写到这里,忽然意识到,莎士比亚讲的那句话“简洁是才智之魂”(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本出自《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人物波隆纽斯(Polonius)之口。但是,这一位“廷臣”本身却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那种“话痨”大有不把人说翻决不罢休的架势,同时也充分表露出“lip-serving”(空口献殷勤)的劲头。不过,那可不是“养唇之道”,或者说与此有关的什么,而是彻头彻尾的“口惠”或“空口应酬”。因而,一方面,他在强调“言以简洁为要”或“简洁是言语的神髓”,而另一方面,他永远是那样流露出“朝臣”身份特有的奉承献媚的丑态。波隆纽斯,因而不就是这样的“不弄被扭死”吗?

既然强调言简意赅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不也会那样吗?
是为序。

蔡新乐

2011年7月20日开封

目 录

- 001 第一章 绪论
- 001 1.1 选题背景
- 001 1.1.1 形象学与翻译学的契合点
- 004 1.1.2 选择凯鲁亚克及《在路上》的译介作为研究个案的原因
- 007 1.1.3 形象学理论简介
- 018 1.1.4 比较文学形象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 028 1.2 文献综述
- 028 1.2.1 关于形象的哲学思考及相关研究
- 034 1.2.2 与形象有关的翻译研究
- 040 1.3 本书的写作目的、方法及结构
- 045 第二章 凯鲁亚克及《在路上》在原语文化中的形象
- 045 2.1 凯鲁亚克在原语文化中的形象
- 045 2.1.1 永远的精神漫游者凯鲁亚克
- 053 2.1.2 作品简介
- 056 2.1.3 创作观念

061	2.1.4 凯鲁亚克与“垮掉的一代” (Beat Generation)
071	2.2 《在路上》在原语文化中的形象
071	2.2.1 《在路上》内容简介
074	2.2.2 写作过程与出版经过
077	2.2.3 《在路上》的经典化过程
083	第三章 《在路上》在中国的形象变迁
085	3.1 用于政治批判的反面教材
086	3.1.1 建国初期的翻译政策与《在路上》的初译
093	3.1.2 翻译与定型化形象的相互影响
100	3.1.3 西方主义式的想象——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
106	3.1.4 官方设定形象与实际形象之间的差异
110	3.2 褒贬不一的畅销书籍
110	3.2.1 新时期翻译政策对“垮掉派”译介的影响
120	3.2.2 合法化努力对《在路上》及作者形象转变的推动作用
126	3.2.3 文学评论中的《在路上》及凯鲁亚克形象的变化
128	3.3 一版再版的经典之作